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之一

《诗经》与楚辞

褚斌杰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之一

《诗经》与楚辞

主编 褚斌杰
撰写 赵敏俐
鲁洪生
褚斌杰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与楚辞/褚斌杰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 中央电大“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课”教材

ISBN 7-301-05922-1

I. 诗... II. 褚... III. ①诗经—文学研究—电视大学—教材
②楚辞—文学研究—电视大学—教材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460 号

书 名:《诗经》与楚辞

著作责任者:褚斌杰

标准书号:ISBN 7-301-05922-1/I·061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mm×1168mm 32开本 8.75印张 230千字

2002年1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4次印刷

定 价:1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绪 论——简叙“风”、“骚”传统	(1)
------------------------	-----

上编 《诗经》

第一章 《诗经》的编集、流传	(15)
第一节 《诗经》的编集	(15)
第二节 《诗经》的流传	(21)
第二章 《诗经》的分类	(28)
第一节 《诗经》编集的音乐分类	(28)
第二节 汉儒解诗的内容分类	(33)
第三节 《诗经》研究的重新分类	(35)
第三章 周民族史诗	(37)
第一节 周民族史诗的认定	(37)
第二节 周民族史诗的多重价值	(40)
第四章 农事诗	(45)
第一节 农事诗的含义及研究动态	(45)
第二节 农业祭祀诗	(46)
第三节 农业生活诗	(49)
第五章 燕飧诗	(55)
第一节 燕飧诗的发生、分类及政教功能	(55)
第二节 关于燕飧诗的研究	(58)
第六章 战争徭役诗	(63)
第一节 《诗经》的战争诗	(64)
第二节 《诗经》的徭役诗	(69)
第七章 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	(73)

2 《诗经》与楚辞

第一节 政治颂美诗	(73)
第二节 讽喻怨刺诗	(77)
第八章 婚姻诗与爱情诗	(85)
第一节 爱情诗	(85)
第二节 婚嫁诗	(92)
第三节 弃妇诗	(97)
第四节 其他诗篇	(102)
第九章 《诗经》的文化精神	(105)
第一节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105)
第二节 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	(110)
第三节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113)
第四节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116)
第十章 《诗经》的艺术形态	(121)
第一节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作论意义	(121)
第二节 《诗经》标志着中国抒情诗艺术逐渐发展 成熟	(128)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创作和周文化精神	(137)
第四节 《诗经》的语言艺术特征	(144)
第十一章 《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151)
第一节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 文化传统	(153)
第二节 《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 艺术原则	(154)
第三节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	(156)

下编 楚辞

第一章 “楚辞”的文体、传播与结集	(161)
第一节 “楚辞”文体的来源和特点	(161)

第二节 “楚辞”的传播与结集	(168)
第二章 诗人屈原的时代与生平	(175)
第三章 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离骚》	(183)
第一节 《离骚》释义与写作时期	(183)
第二节 《离骚》的“忠怨”之情与爱国精神	(184)
第三节 《离骚》的美学内涵与艺术世界	(190)
第四章 情理兼备的长篇咏史诗——《天问》	(199)
第一节 《天问》释义与主旨	(199)
第二节 《天问》的内容与结构层次	(202)
第三节 《天问》的独特形式与文学价值	(211)
第五章 屈原的短篇抒情诗——《九章》	(217)
第一节 《九章》概述	(217)
第二节 《九章》作品研读:	(224)
《橘颂》	(224)
《哀郢》	(227)
《涉江》	(231)
第六章 具有神话色彩和爱国内容的组诗——《九歌》	(236)
第一节 《九歌》概述	(236)
第二节 《九歌》作品研读:	(241)
《东皇太一》	(241)
《东君》	(244)
《少司命》	(249)
《河伯》	(253)
《湘君》、《湘夫人》	(255)
《山鬼》	(263)
《国殇》	(266)
《礼魂》	(268)
后 记	(271)

绪 论

——简叙“风”、“骚”传统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并有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形式、美学理想和发展道路。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 11 世纪至前 6 世纪)近五百年间三百零五篇作品。紧接着,在南方楚地又“奇文郁起”(刘勰语),出现了伟大诗人屈原及其所创造的一种新诗体“楚辞”。它们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各以其自己思想,卓越的艺术成就和鲜明的特色,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两大典范,两面旗帜。故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后世诗人,一般说来,或主要接受了《诗经》的影响,或主要接受了《楚辞》的影响,使诗歌创作沿着《诗经》、《楚辞》所开辟的两条道路不断前进。因此而发展、形成的我国诗歌的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习惯上,就称为“诗”、“骚”传统,亦称为“风”、“骚”传统。

所谓“风”诗传统,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世代相传。

我们知道,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再现生活,并通过对生活真实的、具体的、形象的描写,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创

作是在进步作家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提高,逐步成熟的。在我国诗歌领域,它萌芽极早,源远流长。例如,相传作于黄帝时代的《弹歌》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它描写了原始人“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的狩猎活动,流露着原始人学会制造、使用弹弓的喜悦、自豪感以及渴望获取猎物的迫切心情,重演的正是原始渔猎时代人们劳动生活的片断。可以说,这篇作品已经显示了用诗歌描写现实的意向,是现实主义精神的萌芽。这一萌芽,随着社会的推移渐渐茁壮,到周代,蔚为大观。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就是耸立于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道路上的第一座光耀千古的里程碑。

《诗经》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首推《国风》中的两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国风》民歌,“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广泛、深刻地展现了周代人民惨遭剥削、压迫的实际处境,抒发了他们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怨恨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例如《邶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它详尽描述了农奴们一年四季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褐”、“采荼薪樗”的苦难遭遇。从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为后人形象地概括出了一幅周代被压迫人民悲惨生活的图景。《魏风·伐檀》是伐木者的诗。他愤愤不平地咏叹着伐木制车的沉重劳作,并尖锐质问那班不劳而获的贵族们“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表达了作者反对剥削、反抗压迫的态度和心声。又如《邶风·击鼓》是士兵的诗,《唐风·鸛羽》是行役者的诗,他们控诉了战争、徭役加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田地荒芜,家庭离散,父母无人奉养……。又如《邶风·谷风》、《卫风·氓》等弃妇诗,揭露出古代社会夫权礼教的罪恶和妇女地位的低下,命运的悲惨。它如《陈风·株林》、《邶风·新台》、《魏风·墙有茨》、《齐风·南山》等讽刺性民歌,则揭露出统治阶级种种男盗女娼的行为和极其腐朽肮脏的灵魂。至于《郑风·溱洧》、《秦风·蒹葭》、《王风·采葛》、《陈风·出其东门》等爱情

民歌,反映的则是劳动人民健康、真挚、热烈的爱情生活和高尚、纯洁、坚贞的品操;而像《邶风·柏舟》,反映的则是青年男女对婚姻自主的追求,对礼教束缚的抗争。……《国风》民歌就是这样多方面地,真实、具体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真情实感。它们集中体现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诗经》中,与民歌面向现实,描写现实的创作方向基本一致的还有收于二《雅》里面的文人政治讽喻诗。例如《大雅·桑柔》、《瞻卬》、《民劳》、《小雅·正月》、《十月之交》、《北山》等,闵时伤乱,暴露、鞭挞了西周后期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外族入侵、天灾人祸蜂出并作的社会状况。表现了诗人敢于用诗歌干预政治,针砭时局,讥刺朝廷,忧国忧民的积极态度和进步思想。这类诗,也都是具有强烈现实性的优秀篇章。所以,后人又每每“风、雅”并称。后世推重的所谓“风、雅”,实际指的就是《诗经》中以民歌和文人讽喻诗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作品。

《诗经》,特别是《国风》民歌,在创作实践中创造出了一套与它的现实主义思想内容相适应的现实主义表现艺术。主要特征是:善于用朴素的文风,简洁的语言,巧妙的比兴,塑造出真实、自然而生动的形象,描绘出亲切感人的生活画面,来抒发情怀,反映现实。例如《王风·君子于役》写一位山村劳动妇女怀念她久役不归的丈夫:在苍茫的暮色中,女主人倚门伫望,但见太阳落山了,牛羊回圈了,鸡儿归巢了,家家户户该团聚了,然而自己的亲人却不见回来,一阵孤寂之感、思念之情顿时涌上心头,她默默地呼唤丈夫,“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深深地忧心丈夫,“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这一生活画面被作者写得朴素简净、情景交融、感人至深,很自然地令人想起当时徭役沉重、野有征夫、家有怨女的社会现实,激起人们对主人公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愤恨。又如《小雅·采薇》也是一首抒情写实的佳作。其最后一章抒情、状景、叙事融为一体,把一个征战将归的士兵哀伤时光流驰、路途艰难的思绪表现得深长真切,使人味之无极,闻之动心,强烈地感受到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关于《诗经》表现艺术的基本特征,

尤须注意的是它的比兴手法。“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者，以彼物比此物”，这是《诗经》比兴的一般意义。其中，它也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诗经》的比兴常常与作品所要讽刺和揭露的对象、事件有密切的关联。例如《邶风·北风》是一首讽刺卫国暴虐之政，劝说朋友相携而去的诗：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
亟只且！……

这首诗，如果仅从字面上看，它并没有提到卫国的苛政，而它所以能让人明白它的锋芒所向，主要靠着北风的比喻，启发人从寒冷的风雪联想到残暴的统治。所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针对梁陈之间“嘲风雪，弄花草”却无关现实的靡丽诗风，说：“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这一说法，大体上是符合《诗经》实际的。比兴，确是《诗经》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因其如此，后人即也爱用“比兴”一词代表《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色，所谓“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

《诗经》思想内容、艺术形式方面的上述主要特征，也就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主要特征。从《诗经》开始，我国的诗歌天地里就奔流出一条现实主义的滔滔长河。

历史上直接继承、发展《诗经》优良传统的是两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民歌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周民歌一脉相通，描写了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各种现象，是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汉乐府民歌对于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重大贡献，是它在《诗经》创作的基础上，更发展了以叙事为主的创作特色，将叙事诗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趋于成熟的阶段，从而大大扩张了诗歌反映现实、描写现实的能力和容量。如用五言写作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

南飞》，被后人誉为“古今第一首长诗”。汉乐府民歌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使之成为我国现实主义诗歌道路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降及建安、曹魏时代，在《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我国文人诗出现了第一次现实主义创作热潮。诗人或借乐府古题，或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描叙时事、倾吐怀抱，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深刻揭露了汉末极度动乱的现实，抒发、表现了一种渴望建功立业，“流惠下民”的慷慨昂扬的时代精神，做到了作品充实的思想内容与生动的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这一时期的诗歌成就，被后代倡导现实主义的作家精辟地概括为：“汉魏风骨”、“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所谓“风骨”、“风力”，称道赞许的就是汉魏建安诗歌面对现实、“雅好慷慨”、文质彬彬的创作特色。两晋六朝，坚持、发扬“风”诗传统的主要是北朝民歌。北朝民歌现存六十多首，数量虽不多，却内容深厚、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的社会情况，战斗性较强，酷似汉乐府民歌，在艺术上也有独创性。但这一时期，总的说来，由于统治集团扶植形式主义诗风，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在文人手中转入低潮。此等情况，正如唐人陈子昂所批判的：“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也正是因为唐代有很多诗人都能像陈子昂那样自觉地继承“风雅比兴”，现实主义创作又逐渐繁荣，并且产生了杜甫、白居易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的文学生涯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岁月息息相关的。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政治倾向、崇高的爱国爱民精神，在文学史上素有“史诗”之称。杜甫使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后于杜甫的白居易则以大力提倡和写作“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的“新题乐府”诗而知名当世，流誉千古。他和他的几位志同道合的诗友元稹、张籍、王建、李绅所掀起、进行的“新乐府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理论、有实践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

自宋以下,历代也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比较突出的,例如,宋初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慨叹“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的王禹偁,是宋代最早推崇杜甫、白居易,并写出了不少揭露当时阶级矛盾的诗篇的著名作家。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则于金亡前后,沉痛描绘了“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这种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悲惨现实。不过,元明清三代,代表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成就的已主要不是诗歌而是戏剧和小说。元人关汉卿的杂剧是古代戏剧文学反映现实的杰出表率。清人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著作,标志着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经过长期的发展,终于登上了它的“泰山极顶”。

二

历史上和现实主义相映成辉的另一主要的文学潮流是浪漫主义。

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泉是上古神话。神话以它奇妙的幻想,启发着后代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并以它许多精彩动人的故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先秦时代,受神话影响最深,走上浪漫主义创作道路的,于散文方面是庄子,于诗歌方面是屈原。

庄子散文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充满了虚妄的故事,如写牛蜗左角上的触氏与右角上的蛮氏之间的“伏尸数万”的战争;奇幻的情景,如北冥鲲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在他的笔下,蝉和斑鸠,蛤蟆和甲鱼,蛇和风,栎树和铜铁……一切生物和无生物都在谈笑风生、论难说理。浪漫主义色彩十分浓厚。但是,庄子的浪漫主义是为他的虚无主义、悲观厌世的人生观服务的,“使人逃避现实,徒然坠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深渊,坠入‘不祥的人生之谜’”(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因此,我们说庄子的这种浪漫主义是

消极的浪漫主义。

和消极浪漫主义相反,积极浪漫主义则“力图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在他的心中唤起他对现实和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同上引)。在我国文学史上,稍迟于庄子的屈原正是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他的不朽之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所谓屈“骚”传统。

诗人屈原及其所创造的“楚辞”体作品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屈原的《楚辞》出现以前,中国诗歌,如前所述之《诗经》,还基本上属于群众性口头创作的民歌作品,一般说来,它们内容较为单纯,句式和篇幅也比较短小,特别由于是口耳相传的集体创作,因而还缺少全面反映诗人思想感情和个性之作。《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不能说那些作品没有作者的个性的闪耀,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上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的烙印的,却还没有。(何其芳《屈原和我们》)屈原出现以后,中国文学史上才出现了伟大诗人的名字,出现了集中反映诗人全部思想感情、人格和个性的诗篇。不仅如此,诗人屈原的出现,还给诗坛带来了有别于《诗经》的另一种被称为“骚型”艺术的创作方法,即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积极浪漫主义。

表现进步理想,孜孜不倦地追求进步理想是屈原长篇抒情诗《离骚》的主旋律,也是《离骚》积极浪漫主义的首要特征。什么是诗人的理想呢?诗人的理想就是要在七国纷争的历史关头,把自己的祖国——楚国推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为此,他针对楚国政治的弊端,提出了“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这表明了诗人反对当时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主张不分贵贱,唯才是举,表明了诗人痛恨楚国贵族营私舞弊,“康娱自纵”,“背绳墨以追曲”的腐朽风气,主张整顿朝纲,清明政治。毫无疑问,诗人富强祖国的理想和措施,在战国后期,事

关楚国存亡,符合楚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楚国宫廷的黑暗,统治者的昏庸,却使诗人的理想、抱负不仅不能施展,而且招致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才气纵横、感情起伏的《离骚》就是立足于诗人理想破灭、身遭流放的现实生活,以丰富的幻想、炽烈的情感,描写诗人对上述进步理想的追求、坚持和献身,以及诗人对现实世界的反抗。全诗前一部分是诗人对自己大半生斗争历史的回溯,主要描述了诗人当年的雄心壮志和在奸人群小的诬陷下壮志未酬的不幸遭遇。后一部分是诗人在神话世界中对未来前途的探索,主要描述了诗人救国无门的苦闷和对自己祖国执著不舍的热爱和眷恋。这种内容的描写虽然披着奇幻的外衣,但正如鲁迅所说“其旨甚明”,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楚国的黑暗现实,能够唤起人们对丑恶现实的愤恨和反抗,鼓舞人们为实现美好理想去努力奋斗。这,正是《离骚》积极浪漫主义的本质所在。

采用丰富的神话素材,通过自由的幻想,构成奇特的情节、境界,是《离骚》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首诗从“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以后,尽情刻画了诗人上天下地,神游天国的活动,字里行间出现了一系列众多的神话人物和神域,还出现了众多的灵异事物,所有这些又都一齐围绕着诗人的行止旋转,以诗人为中心组织出了一幅“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壮阔画面。其中,最能表现诗人在不断探索中,虽屡遭失败,仍坚持不懈的生动情节,是四次求女,即一求“高丘”之神女,二求洛水之宓妃,三求有娥之佚女,四求有虞之二姚。十分深刻地反映了诗人内心世界希望和失望的回旋反复,以及他周围环境的冰冷。又如诗中最后一段写诗人在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伍的前呼后拥下,转道昆仑,行经流沙,指向西海,奏九歌而舞韶乐时,突然驻足楚国上空不忍离去,则极为动人地表现了诗人高尚的爱国思想,爱国情操。要之,《离骚》一诗中诗人对理想的孜孜以求的精神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之所以给人难忘的印象正是得力于诗人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构思。即鲁迅先生所说的

“其思甚幻”。

《离骚》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善于利用、发展民歌的比兴手法,来象征他与楚国黑暗势力的斗争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这一特征在全诗的前一部分尤其突出。前一部分,向来被人视为实写,但它与后一部分幻想式的写法依然是和谐的,依然富有浪漫色彩及浪漫情调。例如全诗开头,诗人用寥寥几句说完家世接着表白自己的品德、才干、抱负时,他并不直陈其事,而是用一连串的比喻象征其事,如用“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象征他对德才的磨炼、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象征他渴望进取,用“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象征他振兴楚国的理想,使诗人自己的形象开篇以后迅即具有了浪漫的气质。又如诗人写自己政治上遭受打击时,“掣芙蓉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用自然界极清丽高洁的荷叶荷花,象征自己身居污浊之世而一尘不染的高贵品质。而对于那班“党人”,诗人则给他们带上满腰恶草:“户服艾以盈要兮”;装上一囊粪土:“苏粪壤以充帙兮”。从而表现出诗人与“党人”的鲜明对立;并把这种对立升华为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鲜明对立。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以把《离骚》的“比兴”视为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把《诗经》的“比兴”视为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是因为《诗经》民歌的“比兴”一般都是触景生情,是实写;而《离骚》的“比兴”,都是虚构、想象之辞,是诗人用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人物、抒发情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诗人对传统“比兴”手法的重大发展。

《离骚》的上述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作者对进步理想的执著追求。这种精神也强烈地反映在屈原其他作品中,如《九歌》、《招魂》等都是闪耀着浪漫主义奇光异彩的名篇。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实际也就是一部浪漫主义的诗歌总集。

纵观《楚辞》以后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由屈原创点的积极浪漫主义的火炬也在一代一代往下传,形成了和“风”诗传统面貌不同的

另一大文学潮流。汉代,继承屈“骚”精神的杰出人物是辞赋家贾谊。他的几篇“骚体诗”、“骚体赋”,如《吊屈原赋》,《鹏鸟赋》“俱有凿空乱道意。骚人情境,于斯犹见。”(刘熙载《艺概》)汉末建安时代的曹植,其诗风与他父亲曹操不同,浪漫主义倾向比较突出。他的诗歌作品《白马篇》、《蝦蟆篇》及抒情体赋《洛神赋》就是这一倾向的结晶。所以,后人说:“曹子建之诗出于《骚》”。曹魏正始时的阮籍有《咏怀诗》多首。这一组诗或用自然事物,或借神话游仙来隐约曲折地象征现实生活,“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显然深受《离骚》“比兴”的影响。两晋六朝时,对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有所贡献的是左思、鲍照。其主要特征是以雄健豪放的诗风,表达反抗现实的内容。左思《咏史》八首,笔力矫健,情调高亢,借古讽今,揭露鞭撻了西晋腐朽的门阀制度,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左思风力”。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以奔放的七言杂体歌行,抒发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悲愤不平之气。清人刘熙载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此鲍明远赋句也。若移以评明远之诗,颇复相似。”这种“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的品评,生动形容了鲍照浪漫主义的豪放气势。这一时期,除左思、鲍照外,北朝民歌《木兰诗》、南朝民歌《神弦曲》和传为蔡琰所作的《胡笳十八拍》都是影响很大的浪漫主义作品。

唐代,许多诗人都能自觉地继承这一传统,生活于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屈“骚”传统,以炽热强烈的个性,排山倒海的气势,神奇莫测的想象,龙吟虎啸的语言,抒发叛逆的思想情感,表现盛唐的社会生活,创作出了一大批内容、形式高度统一,高度完美的作品。这些作品扩大了浪漫主义的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标志着屈原开创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新阶段、新高度,也使李白成了历史上继屈原之后崛起的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中唐,能学习屈、李而又独树一帜的优秀诗人是李贺。李贺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辞藻上都乐于创新。他写得出:“黑云压城城欲摧”,想得出“荒沟古水光如刀”,他还写得

出：“一泓海水杯中泻”，想得出：“天若有情天亦老”，他甚至描绘出了“幽兰露，如啼眼。……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这种荒诞迷离、艳丽凄清、幽灵出没的“苏小小墓”。因而使屈“骚”浪漫主义传统中又多了一种奇崛幽峭的风格。与李贺同时代的诗人杜牧，就指出李贺诗“盖‘骚’之苗裔”（《樊川文集》卷十《李贺集序》）清人李叔亦直称“长吉诗出于‘骚’。”（《昌谷集句解定本》）两宋时期，屈“骚”传统盛于词坛。以苏东坡、辛弃疾为代表的所谓“豪放派”，其实质即是“浪漫派”。苏词以旷达飘逸的风神见长，如“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辛词则以雄奇博大的境界著称，如“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他们对古典浪漫主义都各有补益，各有建树。元、明、清三代，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尤为小说家发扬光大。明人吴承恩《西游记》所幻想的神魔世界，交织着深厚的现实内容，表达了作者对当时政治的愤懑和他自己的社会理想。清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通过对花妖狐魅、阴曹地府的描写，寄托了作者的“孤愤”，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至于诗歌领域，明末陈子龙、夏完淳等抒写国破家亡的痛苦，凄楚激昂、悲壮淋漓，是继承屈“骚”精神的出色的爱国诗人。

以上我们简单概叙了古代文学史上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风”、“骚”传统的特征和源流。其中，我们列举的那些分别归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作家，是就他们的主要创作倾向、主要艺术特征而言的。实际上，我国古代具有进步倾向的诗人几乎个个都接受了“风”、“骚”两方面的影响。他们往往既有浪漫之作，又有写实之作。在不少诗人的身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征都很鲜明、浓重，以致我们很难说他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这些情况提醒我们，考察历史上的文学流派，务必坚持具体分析。即使对创作特征十分明显的作家，其作品也不能一概而论。

最后，我们想特别说明，“风”、“骚”传统虽然是历史上两种不同